

| 文学卷 |

2015 年 第 2 辑

总第二十二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勵耘學刊

敬題
勵耘

一项未竟的现代工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能与意义

民国时期新疆经济政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

刘勰对工作性质的自觉与《文心雕龙》

同源而异流——中日「黄粱梦」文学差异新论

先秦乐师、瞽蒙、瞽史辨

从文学到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



學苑出版社

勵耘學刊

(文学卷)

2015 年第 2 辑

(总第 22 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励耘学刊. 总第 22 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77 - 4935 - 9

I. ①励… II. ①北… III. ①中国文学 - 文学研究 -
丛刊 ②汉语 - 语言学 - 丛刊 IV. ①I206 - 55 ②H1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2828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 163. com](mailto: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 - 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2.00 元

《励耘学刊》（文学卷）编委会

顾 问 童庆炳

主 编 郭英德

副主编 李春青 李 山 李 怡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翠玲 万建中 王向远 方 宁

乐黛云 过常宝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正荣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李 强 杨 义 杨联芬 吴福祥

张 健 张涌泉 张清华 陈思和

郑国民 项 楚 赵 勇 姚建彬

郭英德 黄开发 曹卫东 盛 宁

董晓萍 蒋原伦 蒋冀骋 温儒敏

冯胜利（美国） 大西克也（日本）

徐富昌（中国台湾） 黄坤尧（中国香港）

李欧梵（中国香港）

编 务 许庆江

目 录

新视域

重释“Deconstruction”:媒介和文学之中的“消失”

- 张正平教授访谈录 [美]张正平 王晓玉 李 莎(1)
- 一项未竟的现代工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能与意义
..... 余夏云(9)
- 民国时期新疆经济政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昌平(27)

文学史专题

- 刘勰对工作性质的自觉与《文心雕龙》 高宏洲(37)
- 论方以智的文章学 武道房(49)
- 乾嘉诗话中的韩诗奇险论 严 明(72)
- “母亲”与“吃人”
——《狂人日记》细读 肖 严(93)
- 周作人与《河南》杂志 袁桂娥(108)
- “中国的一日”有奖征文与“想象共同体”的构建 门红丽(119)

文化研究

同源而异流

- 中日“黄粱梦”文学差异新论 杨秋红(134)
- 刘亮程的生态存在论意义 白 浩(147)

文献考辨

- 先秦乐师、瞽蒙、瞽史辨 孙丽旻(170)
- 清代文评专书整理与研究综述 诸雨辰(179)
- 郭沫若归国抗战陈布雷“起了关键作用”考 廖久明(200)

青年园地

- 从文学到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 王文超(218)
- 曹端理学思维对民间信仰的祛魅
- 兼论曹端对谢应芳《辨惑编》的接受 刘 洋(228)
- 被建构的叙述:晚明公案小说中的淫僧故事 薛英杰(241)
- “诗歌”语词使用与 20 世纪 20 年代新诗的探索 丁晓妮(260)

书 评

-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路
- 评葛良彦《士人与国家:中华帝国晚期作为
- 政治话语的小说》 冯晓玲(276)
- 话本小说综合研究的新标杆
- 评刘勇强著《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
- 历史构建》 朱锐泉(288)

重释“Deconstruction”:媒介和文学之中的“消失”

——张正平教授访谈录

◇[美]张正平 王晓玉 李 莎

受访人:张正平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传播系教授

采访人:王晓玉、李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3年博士生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2日

采访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咖啡厅

张正平(Briankle Chang)教授,198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在马萨诸塞大学传播系执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哲学、文化研究、媒介理论和批评。他是第一个将德里达思想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其著作 *Dec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 Representation, Subject, and Economies of Exchange*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被誉为“传播哲学领域的开山之作”。编著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2年),被誉为第一部传播哲学选本。译著《他者的单语主义——起源的异肢》(*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问:张老师,您好!我们注意到传播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赞誉您的著作 *Dec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 Representation, Subject, and Economies of Exchange* 为“传播哲学领域的开山之作”。也就是说,您的研究路径实际上是把哲学引入传播。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去思考并追问“传播”的形而上学维度?您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胡塞尔的哲学为基础谈“传播”的,这些与美国传播学界的常规研究路径大约是不同的吧?

答:我想以上的研究特点得益于我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我大学

一年级的专业是哲学,二年级转入传播系。转换专业并不是说我对哲学没有热情,而是思考哲学问题的同时对传播学产生了兴趣。传播系里一位比我稍长几岁的年轻教师,他居然在第一堂课有声有色地讲解维特根斯坦。受他的启发,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在传播系也可以这样去做研究,由此开始有意识地融合个人的兴趣和专业知识,开始抽象化地思考传播问题。有意思的是,大学时代我写了一本关于传播的书,第一章叫作“传播的形上思考”,这次写作经历似乎影响到了我日后的研究路向。诸多哲学思想当中,我对胡塞尔哲学有着经验上的认同和长期的关注,博士论文自然地就由胡塞尔哲学而发。喜欢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传播,这更像思想的历险,非常精深且挑战性极大,故而对传播哲学始终保持着兴趣。当然,哲学对我个人也有很多影响。比如说,日久天长它会改变你看待问题的方式,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映入眼帘之时都会自然而然的哲学化。

问:在美国学界,您是第一位将德里达思想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请谈谈您是如何对德里达的思想感兴趣的?以及您的研究与德里达思想的关联性。

答:20世纪60年代末期,德里达在美国人文学科中的影响非常大,关注德里达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阅读德里达从 *Speech and Phenomenon* (《声音与现象》)开始,后被译为 *Voice and Phenomenon*。德里达在这本书中顺着胡塞尔的逻辑得出了反胡塞尔的结论,让我非常震撼。我对哲学很感兴趣,也很早就发现胡塞尔《笛卡尔沉思》第四到第五章中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我的博士论文 *Dec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 就是基于这个问题探究传播。简单地说,传播从个人出发,既然要传播当然也需要把另一个人拉过来。传播双方如何传播,涉及主体间性问题。论文中我就是在德里达的思想下继续做思考,用德里达的方式来解决传播中的 mediation 问题。

问:从您的阅读路径来看,似乎是从胡塞尔到德里达是自然而然的思想过程,请您讲讲这其中的逻辑脉络吧。

答:要知道,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就不可能有德里达。德里达是在与胡塞尔严谨的对话中成就了自己。《声音与现象》一书中,德里达发现其实胡塞尔的研究正在说出与胡塞尔自己相反的结论,他向我们展示了胡塞尔如何打倒胡塞尔自己的过程。透过德里达的研究,我们会清楚地

意识到德里达比胡塞尔更加地还原了胡塞尔的思想,比胡塞尔更加地胡塞尔。这是什么意思呢?

胡塞尔在讲“意义”的时候,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符号”。一种是指号(indication),例如,你看到红灯就知道要踩刹车。可是,红灯与踩刹车有什么关系呢?但你却知道该去做什么。这个由意识勾连外物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指号(indication)。另一种符号叫表述(expression)。比如,人在痛苦的时候会流眼泪,这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表达,由意识到现象的表达。从单词的构成也可以看出表述(expression)的特质,“press”是压,“ex-”代表向外压,是由内而发的过程。而指号(indication)却没有内外的关系,它是外在现象之间的互相联结,由意识站在第三者的位置来看。胡塞尔认为两种符号中表述(expression)是比较基本的符号,指号(indication)建立在表述(expression)的基础之上。

德里达一句一句地分析胡塞尔的话,他发现按照胡塞尔的逻辑,整个现象学建筑在意向(intention)上面,需要一个去指向另一个(one indicate another),所以指号(indication)反而是基本的符号。指号(indication)反而是最基层的,表述(expression)实际上是建立在指号(indication)之上的。

问:谈到德里达的思想,deconstruction 似乎是其中的关键词,中文译作“解构”,这个词颇能代表德里达的思想样态。

答:的确如此,但这个词的意思需要审慎地理解。德里达的“解构”不是康德、马克思的批判,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析”。“解构”(deconstruction)是什么?是跟着别人的思想去讲,顺着别人的逻辑去走,去还原别人的思想。当你跟着别人的逻辑去走,在之中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批判的。许多人讲的“解构”之后,更是一种普遍的误读,在中国学界很多,美国学界较少。美国学界误读的原因在于德里达的研究对于整个西方传统的冲击力太大,基于这种冲击力一批人给德里达贴上解构传统的标签。学习、阅读德里达,最重要的不是去看他的观点,一定看他怎么去探讨问题,完全看他怎么表现(performance)。

再提供一个思路。最早的“阐释”起源于解读《圣经》,通过解读《圣经》来解读上帝的语言。从基本生成上,上帝是超越并高于人的存在,故而只有上帝的语言有解读的必要,解读上帝的语言才是“阐释”。当东西需要被解读的时候,一定是两层的。至少在结构上是两层的:一个是现

象,一个是本质。解经也同样,人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東西是表面的,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存在,所以才去解经。如果没有本质那么只是观察,而不是解读。两层的话,表层后面一定有秘密。传统的解经就是去发掘上帝语言背后的秘密,秘密挖掘出来那么解经工作也就结束了。当然,假若有人认为挖掘得不够深入,不能完满地呈现秘密,那也可以继续阐释。但在原则上他们是一样的,认为秘密可以通过解读的过程被挖掘出来。

还有一种“秘密”没有隐藏任何信息,不需要像解经那样去挖掘。你需要做的只是让秘密出来而已,就像折断一片树叶让树汁流出来,树汁就是“秘密”。德里达想讲的就是第二种秘密,他不是去挖掘什么文本的秘密。他所界定的不能判定(undecideable),不是意图讲文本意义不能决定,也不是要把原来存在的结构拆解掉,他只是呈现出“秘密”而已。

问:很有启发!您在“思想的旅行”国际研讨会上^①的发言《媒介之消失》(*The Dis - Appearance of Media*),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文中您从“媒介”概念切入,以菲力皮德斯(Philippides)的故事为案例生动诠释了“媒介之消失”的特征。您谈到“媒介”(media)既是连接两事物的“第三方”,又是“不断伸展,包容万物的地平线”、“既是其自身又是他者,既是一亦多于一”,讨论媒介即是讨论差异之超越,即是讨论趋近他者。可以说在您看来,媒介(media)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精微而广大,外延似乎可以拓展到整个文化领域。

答:是这样。但这个讲稿中我只是列举了两种“媒介”的定义,对“媒介”的界定还有很多。我所讲的第二种“媒介”,认为媒介是包含着一切存在的“他者”,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以太”观念。我只是借用上面的两种定义用以描述传播,或者说这两个定义为我提供了一个探讨问题的平台。我主要是要以“消失”的观念为起点去研究一些其他的问题,一些抽象的媒介问题。如以“消失”(disappearance)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去思考“习性”(habit)、福柯的“实践”(practice)等等。“媒介”可以是物质(material)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功能性“中介”。我感兴趣的不是狭义上的日常“媒介”及其传播的内容,像作为媒介的电视及其播出的具体节目内容,而是应用于两者之间的抽象化的“媒介”,是媒介的“形式”。例如,

^① 2013年10月19—2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的京师大厦召开。

西方宗教中的耶稣、十字架等符号都是抽象的“媒介”，借助十字架这个“媒介”可以沟通或凝聚许多东西，如时间、空间，过去和未来，我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抽象的“媒介”。

问：“消失”(disappear)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您为何会从这个前提去思考媒介？谈谈这个思想的来龙去脉。

答：这些年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开始，我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研究兴趣在于，如何把传播作为一种可能的哲学概念。实际上对“消失”这个问题的阐释贯穿于我的博士论文，一直到我对德里达的阅读和译介。我曾翻译了德里达的《他者的单语主义——起源的异肢》(*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一书，里面也大量地提到了语言的存有和消失的问题。那么，消失这个复杂的结构关系可以说是我建构传播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我至今仍然倾心于此，我尝试用我所谓的 postal principle(寄信的原理)来对传播(communication)进行概念性的思考。

消失(disappearance)首要是一个基于视觉的观念，唯已然出现的事物方可消失，凡出现之物皆有消失之可能。以视觉为中心，消失意味着一种存有(presence)与缺失(absence)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在消失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谈论可见的(visible)与不可见(invisible)的，这是一个现象的两面。

媒介的消失就是说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必然在其出现之时隐退，它必须隐入其做功之中，正是在隐退的过程中媒介延续了它的功能。或者说，在媒介成为媒介的范围内，媒介是以隐退至不可见的方式来呈现其意义的。当我们重新审视媒介制造的奇迹，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并不是媒介自身，而是虚空。以菲力皮德斯从马拉松狂奔到雅典报信的故事为例，作为一个为雅典送信的信使，菲力皮德斯在信息到达的那一刻倒地而亡。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这个故事呈现了信息发出和接受的命题。信息传递完成，邮递员菲力皮德斯旋即消失，他从任务中撤回自己，他为递送的信息所抛弃。正如白纸需要隐退纸上的文字才能被读取，媒介既呈现为做功又消失于做功之中。

问：也就是说，“消失”这个概念包含着复杂的结构关系，而且恰好指向现象或世界的本原，所以会成为您思考媒介问题的哲学前提。“消失”

这个概念中潜在的 presence 与 absence 之间的关系,让我想起中国哲学特别是老子讲世界本原也是基于有无关系的探讨。海德格尔也仔细地研究过老子。如果说“消失”这一思想从德里达而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德里达与海德格尔思想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深切的联系?

答:我写过一篇论文,专门谈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海德格尔在讲“存有”,即讲我们怎样能体会到存有的时候,认为只有经过“无”才能体会到“存有”。德里达分析,获知“存有”虽然需要通过“无”,但“有”一定是存在于“无”之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无”认识“有”。而我们试图确知“有”的时候,又必须先谈“无”,才能看清“有”。

这里要注意,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有”、“无”间的高下关系是不能判定(undecidable)的,讲“无”必须先讲有。德里达讲的永远是不能判定(undecidability)的问题,不能判定并不是指语言意义、文本意义不能确定,而是讲二者间不能分割。还是看英文单词,什么是决定(decide),决定就是切断(to decide is to cut, to make decision is to cut it)。以“有”、“无”为例,不能判定(undecidable)只是意味着“有”、“无”二者间不可分割(cut)。

问:您刚才谈到“消失”是建构传播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您尝试用所谓的 postal principle(寄信的原理)来对传播(communication)进行概念性的思考。请进一步谈谈 postal principle(寄信的原理)。

答:寄信原理是一个结构性观念,是传播的结构。什么是结构性观念和结构性思考呢?对传播的结构性思考,需要像现象学家那样悬置日常的生活经验,由观念思考观念。例如,两个对立的观念构成结构关系,对立并不仅仅是两个观念关系的全部,连接两个概念的实际上是不可言说的第三个观念,观念衍生观念才构成观念的结构。观念不是孤立的存在,我们需要依据观念所构成的结构,也就是在既有的“关系”中思考个别观念。对传播的概念性思考是以 post 观念思考传播观念。

德里达在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一书中曾界定过 post 观念,他认为 to post is to put sth forward with a halt,这是 postal principle(寄信的原理)的思想资源。从传播的角度看,postal principle(寄信的原理)强调传播的起点包含着终点,终点又包含着起点。传播或者递送行为发出的目的是使信息到达,一旦递送完成,媒介需要消失,因为媒介不再被需要。但正是因为媒介从任务中撤回自己才为其再次出现制造

了空间。菲力皮德斯这个故事开始之时已经含有一个终点,它只能终于起点。菲力皮德斯又是经由死亡“递回”自己,经由“消失”超越了肉身的消亡并被带入历史之中。

问:您刚才还提到您翻译过德里达《他者的单语主义——起源的异肢》(*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一书。这个译本文笔精雕细琢非常优美,有一种诗意散发其间。您的译序非常有意思,集中聚焦于语言的“消失”,却是用了一些诗的语言,有一种得意忘言之美。比如说:“语言的消失并不是狭义的贫乏与虚无,而是语言消失在语言自身的行为过程之中。语句如果出现,它永远出现在语言本身的消失之中。我们可说,语言的现象与结果不过是一个午后的影子,轻风下的水纹,所爱的香水无痕,语言即时的我,当下变成消失的她。语言化消为长,亦在长中消失。”^①我想文学语言里谈“消失”,从中国传统去理解的话,大约与先秦到魏晋时期深刻的言意之辩有关。您谈到文学创作应该对“故事的媒介本身有所突破与拓展”,谈到语言“消失”的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作之可能,这个角度大概代表您的文学观?您为什么会选择翻译这本书?

答:我想是的。文学对于我来讲就是那些探索语言之可能的创作。文学作品中以语言为媒介的信息传递过程与传播学中媒介传递讯息的过程有着共通的结构。即信息(message)的传递不在于言词(word)本身,言词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信息的传递的意义在于沟通行为所带来的沟通之可能,在于不断传递出的不确定性。由此角度出发,文学中的语言行为使信息传递成为可能,语言自身的行为就包含着诸多可能性。语言的功能就是把“消失”转换成“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能拓展语言空间的文学创作才能称作真正的文学。文学作品中语言传递信息之时,语言也将会消失在语言自身的行为过程当中。

翻译这本书纯属机缘巧合。起初,德里达让他的学生 Patrick Mensah 将这本书从法文译为英文。Patrick Mensah 在美国教书,学术和语言功力过硬。他又和我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对他的英译非常信服,也有了翻译的想法。而阅读他的译作之后,我发现这部书篇幅虽小,却能启人深思。

^① [法]德里达:《他者的单语主义——起源的异肢》(*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张正平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0年。译序《有无语言/语言有无》,第12页。

所以我翻译了这本小书,并在台湾出版。

问:讲讲您目前有哪些研究规划和兴趣?

答:我目前在编一本书,以“本雅明与中国的关系”为主题。个人兴趣,因为德国的媒介理论逐步传入美国,我会去关注他们的最新成果。过去的二十年间,德国的一些学者受福柯、德里达思想的启发对传播有了新的认识。美国的报刊专门介绍了这类研究,并命名为“德国媒介理论”(German Media Theory)。具体来讲,他们是运用媒介考古的方法重新书写科学文化史,就是说他们追溯的“媒介”的历史,不单单是一部器物史,而是去研究“媒介”的功能,即追溯器物或者说技术(technic)如何使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发生变化。虽然他们从唯物的层面出发,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描述,而是在不同层级不断地向前推进。我主编有一个杂志 *communication + 1*,里面也有一些我关注的话题。也会去关注一些拜占庭神学、艺术史方面的书,其中的神学、政治观点在知识上给我很多启发。例如,我逐渐意识到福柯的研究就是筑基于这些知识之上的,也会对拉康有进一步的思考。

一项未竟的现代工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能与意义^①

◇余夏云^②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常变常新,最新的研究成果总是不断改写我们对它的既定认识,使其成为一项未竟的现代工程。海外世界的相关论述,作为重要的改写资源,宛如“改变游戏的人”,不仅从细枝末节处丰富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知识,而且也循此触动吾人勤思“其到底源起何处”的问题,敦促我们不断体认到现代文学的当代性,以及其流动不居的学科特征。当然,也由此挑动中外学术的对话、协作,为深度挖掘现代文学提供可能的根基。

关键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改变游戏的人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文学”是什么?当我们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某些具有“干扰性”的意象总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它们包括“现代文学”这个语词所涉及的疆界、对象、分期、主要特征、参照系统等等。这些内容,已经渐成“惯习”。它们提供了关于“现代文学”阐释“理所当然”的方向及架构。当然,也毫无疑问地妨碍着我们的思考。这种妨碍不见得是错误的,可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其已经在无形之中使得“现代文学”趋于平面化和静态化。此举虽然大大便利了知识的普及,但是,“压缩差异、提出公分母”的做法,确实更像是百科辞书的做法。尽管不该否认,辞书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作为‘方法’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71)和西南交通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与建构”(项目编号:2682015RC22)的阶段性成果。

② 余夏云(1982—),男,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晚清文学研究。

也完全有能力揭示概念的复杂性,甚至有可能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呈现,但是,这种揭示往往只是揭示出一些“结果”,而非变化着的“过程”。它把书写对象当作一个趋于静止客体,就如同“现代文学”一词的惯常用法所暗示的那样,它已经在1949年宣告完结。

可一旦注意到,有关“现代文学”的研究仍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其丰富的成果也在不时地转换成新的技术指标,变更甚至变革着我们对它的传统释义,那么,我们就不能草率地将之处理成一个“静默的客体”,而需要把它还原成一个未完的工程、一种建设中的“话语”(discourse)。论者或要指正,“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毕竟是相异的两个范畴。可是,即便是对“现代文学”最稀松平常的界定,都已经吸纳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既有成绩。譬如,“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祖师奶奶”这一论调,就有效地转化了自夏志清以来一批学者的看法。也因此,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史判断,更有着对学术史内容的消化和提炼。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绝对不是彼此分离的关系,而是高路兹(Elizabeth Grosz)所谓的相互定义(mutually defining)^①:前者圈定后者的基本活动范围,而后者又改写着前者的既有定义,如此循环往复、变动不居。从一方到另一方,已不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文化研究者所谓的“回路”(circuit of culture)。一个成品(product),从生产(production)到消费(consumption)、认同(identity),直到外在的规制(regul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都被有机地关联起来,彼此牵制、影响,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②。

这个网络体系的存在,提示我们,探讨“现代文学”和其研究的关联,并不是在玩弄一个狗逐其尾的文字游戏:“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已经终结,但是作为一种话语,它仍在不断的建制之中,是一种社会化的存在。通过成功地吸收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各种资源,“现代文学”已经成为社会领域内一个大型的文化制作产物,它不复停留在历史上作家们努力创作它的那个时间定点上。

可以说,任何一个有志于还原“现代文学”动态特性及其立体观的学者,即使不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那样细密地构筑一个穿行在文化

① Elizabeth Grosz.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Bodi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103-110.

② Paul du Gay, Stuart Hall, Linda Janes, Hugh Mackay, & Keith Negus.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 3.

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词系谱^①,或者如比较文学学者那样铺陈一脉有案可稽的跨语际实践史(translingual practice),以图彰显概念的生成性^②,那么,他至少要把有关“现代文学”阅读、批评、阐释的环节和历史考虑在内。至此,一个被遮蔽已久或者说不太受重视的理论课题,于焉浮现,那就是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

二、议题的浮现

如果说,关于叙事的叙事可以称为“元叙事”,那么,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则自然可以视为“元研究”。“元研究”的核心意念在于,对“研究”与“文本”之间彼此定义的“互文关系”进行探讨。比如“重写文学史”。该理念是在对“文学史”——这种特殊的研究形态和学术成果——进行广泛检讨之后提出来的,是为“研究的研究”;而其研究的旨归——“重写”,所带来不仅是对传统文学史写作范式(paradigm)的改变和冲击,更是对“文学是什么”——这个文学本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认知。而这一认识的获得,又是基于研究的研究。而与此相继,一旦“文学”被重新命名,由此展开的研究,又势必带来一番新的风貌。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与研究相互定义、彼此推进的意义上,我们说“重写文学史”才真正发生,否则,它不过是在玩弄一个正反易位的权力游戏:用一部文学史去取代另一部或另一些文学史。

这是一个严肃的文学研究者需要规避的。而最佳方案,或许可以通过确立研究本人和其对象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来获得。这个“位置”,并不是文化研究者所讲的:任何知识和论述体系的形成,都受到它所在历史和社会的制约这一点。张隆溪已经批评了该观念,他说:“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知识生产的‘位置性’未免把人的思想太过局限于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让人想起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常常被人诟病的那句话,‘人吃什么,就是什么’(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这个概念也一反西方文化研究标榜的解放性,恰恰压抑了

①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②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